

亞洲文商學院的回憶

端 正

三年前的夏天，我剛在廣州高中畢業，跑到這陌生的殖民小島上，升學的問題，曾經苦惱着我。終於，在偶然的機會中，我放進了當時由錢穆先生所創辦的亞洲文商學院。

開學的那一晚上是最值得追憶的。在九龍偉詩街華南中學三樓的一個小小教室中，三十多位同學圍坐成一個圓圈，每人座前的桌上放着些菓糖餅干及汽水。進門口的座位是空着留給老師們坐的。也許因為大家都是初入大學，而且都是互不相識，所以都靜穆地等待師長們的來臨。

那天到會的師長有錢院長，張丕介先生，崔書琴先生，劉尚義先生和程兆熊先生等。在亞洲文商學院的那一個學期，錢先生教我們國史，張先生教我們經濟，崔先生教我們政治，劉先生教我們國文。此外還有唐君毅先生教哲學，夏先生教英文，但那天這兩位都沒有出席，而程先生是在新亞書院時代才在我們書院授課的，因為他是當時亞洲文商學院的贊助人，所以也被邀參加了。

第一個印象是深刻的。當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張丕介先生。在各位師長還未發言時，張先生的態度是沉默的，彷彿這個聚會對他無無限的感慨。錢先生那天穿一件綢質的長袍，態度和愛，他給與我的印象不如張先生那末深刻，但却使我感到一陣親切。程先生一望而知是個敦厚謙和的人，但却很難使人猜出他是巴黎大學博士，而且對文史方面有極精湛的研究。

席上，使我留下較深刻的印象的就是這三位，而他們的講話，至今亦隱約記得。

錢先生那天便懇切地講述了他的教育宗旨，叫大家不要斤斤於學分 and 文憑的獲得與夫只求職

業之解決，須有廣遠的眼光，先重通識，再求專長，方有偉大之前途。跟着，張先生便講述了一些關於武訓的事，沉重而懇誠的語調，使我覺得這學校有點不平凡。最後程先生說了幾句祝頌的話。之後，這莊穆的氣氛便變得融和起來了。

亞洲文商書院的創立，完全憑着一個理想。創立之始，不獨沒有圖書儀器的設備，連上課的教室也是租借的。後來為了方便遠處同學起見，才在砲台街租了一層樓做宿舍。那時，我是在那裏住宿的一個，錢先生就在房子的一角隔了一個小房間住下，這房間除放了一張木板床外，僅容一桌一椅而已。因為當時是夜間上課的，所以我們都輪流來自己燒飯，衣服也是自己來洗。

因為當時錢先生和唐先生在沙田華僑工商書院都擔任了些課程，所以每日下午趁火車趕來上課，白天又匆匆趕去沙田，而錢先生的小房間，也就和唐先生輪流地住宿了。有時因為當晚他們都有課程，唐先生便要和我一樣睡在木架床上。

錢先生在當時真可謂是食宿均無定所的。他有時在外面的館子吃，有時就買些麵包回來吃，也常常和我們一起吃。和我們一起吃時他往往給錢我們買鮮蝦來加菜，飯後也常請我們吃香蕉。一次，我因為在外面教書，遲了回來，同學們也忘記了留菜給我，錢先生也因為回來得較遲，自己加了些菜正在那裏用膳，看見我回來，便把自己的菜分了一大半給我。當時我只覺得一陣家庭的溫暖。

在那狹窄的宿舍裏，錢先生常常在那裏渡來渡去，他的心情常是沉重的。也許因為精神上刺激太大了，而日間又往往疲於奔跑，曾經在一連

幾天的晚上，我被錢先生的囁語所驚醒，而唐先生也在夢中「天呀！天！」的呼喊。就在那時起，我便認識了這兩位先生深藏在內心的憂難之情了。

由於程兆熊先生在台灣替學校招了二十位左右的同學來，一方面帶給錢先生以興奮，一方面也使他煩惱了半個多月。因為砲台街的房子絕對不能再容納這二十位新同學了，另外租一所嗎？幾千元的頂手費即無法籌措。為了解決目前的問題，終於在香港英皇道的海角公寓租了幾個房間，同時即作為臨時課堂。

在學期將要結束的時候，由於廣州的易手，我家的經濟環境已不能負擔我的讀書費用。幼稚的我，只感到徬徨與惆悵。當時，錢先生曾經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：「范仲淹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，常謂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然其讀嚴光子陵，則曰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」。可見伯夷之清與伊尹之任，義無不通，從此參入，庶可謂知學矣。十二月二十二日夜為學院諸生講漢代學風，偶發此義，即書以勉端正。」唐君毅先生這樣寫道：「思則得之；弗思則弗得也。」「君子貧窮而志廣，富貴而體舒，安燕而血氣不驟，勞倦而容貌不枯。」張丕介先生這樣寫道：「奮鬥萬物母，人神以是分；或奴或為主，清濁在一心。」這些話，曾經深深地激動了我傷別的情懷，實在不忍離開這些老師，因為我們都變成了我生命的泉源。然而，除了離別以外，我有什麼方法挽救呢！我曾經在日記本這樣寫過：「悲前途之茫茫兮，面山風而沾襟。」

我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，曾

經把我請求免費工讀的呈文這樣紀錄着：「……我不願意傭工於市儈之中，更不願意因這式微的家庭影響了我的學業，尤其不忍離別這可愛的學校，在這許多條件中，我找不出一個折衷的辦法。……在一個清涼的黑夜裏，我仍然踱步在幽僻的恤孤院道上，猛然想出了一條絕無而僅有的生路，希望學校能賜與一個工讀生的職位，生願担負學校中可能勝任的工作。……」當時我並未獲得即席的答允，但錢先生和唐先生都曾經懇誠地安慰着我。

是一個春風迎人的下午，我和一班高中時代的同學到沙田旅行，正在公路旁邊小歇的時候，却巧錢先生與唐先生在那邊款款而來，他們和我親切地握過了手，便告訴了我學校已允許我免費工讀的消息。那時我但見白雲飛舞，野鷺翱翔。

當時我們學校的境遇雖然非常艱苦，但是各位老師既然都是決心以武訓的精神，求理想之實現，則目前之困頓，自在意想之中。錢先生曾經這樣地希望着：假如我們能在郊外找到一塊地方，蓋幾間房子，先生和同學生活在一起，有空的時間種種菜，養養雞。還可以添辦附屬中小學，讓這學校變成了一個家庭。這樣的一個希望，好幾次都差不多要實現了，爲了找新校址的問題，沙田，大埔，元朗等地，錢先生都奔走了好幾次，但都因爲事情中途起了變化，這一個樸實的理

想也就只好擱置下來了。

亞洲文商學院的校主是劉尙義先生。大概因爲和錢先生之理想有些距離，就在一九五〇年的寒假裏，錢先生便在報上聲明辭退了亞洲文商學院院長之職，後來得到王岳峯先生的幫助，才在桂林街創立了新亞書院，改爲日間上課。

這都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，在以後的日子中，新亞書院也會經歷過幾番艱難，直到現在，雖然還是只有幾十位同學，但由於師生間精神的結合，新亞夜校的創立，音樂演奏會的演出與乎校刊的印行，都充份反映了新亞精神之發展。比之亞洲初期，連一椅一桌都要借用，實不能不說是一大邁進，而在我們師生精神上也是一個大大的安慰。